

世界各地纪念“四·二五万人大上访”

新闻快读



▲ 4月19日，法轮功学员在台北市府广场前集体炼功。（明慧网）

今年是法轮功学员“4·25 万人大上访”27周年，世界各地的法轮功学员都在以不同方式，纪念这个特别的日子。

纽约法轮功学员将于4月25日再次走上街头，举办大型游行与集会纪念“4·25”；台北法轮功学员4月19日在台北市政府广场举行纪念4·25活动，多位议员和名人到场声援，对法轮功学员27年来坚持和平反迫害表达感佩与致敬；4月16日，澳洲悉尼法轮功学员在金融商业中心马丁广场举办“4·25”纪念活动，多位嘉宾在集会上发言。

澳洲勋章获得者、资深法学家大卫·弗林特教授在集会上赞扬法轮功“是黑暗中的一束光，照亮世界”。弗林特教授在发言中揭示：“中共为什

么会对一群在公园里练习舒缓功法的法轮功学员感到恐惧？这不是因为法轮功有政治诉求，他们的理念就是真、善、忍。法轮功在中国一开始就广受欢迎，人数超过了中共党员的人数。其实这就是中国人对自己真正想要的做出了一次无声的公投，这让中共无法容忍截然不同的真、善、忍信仰体系的存在。”

1999年的4·25上访是法轮功学员为阻止中共蓄谋已久的全面镇压，所采取的一次大规模的自发的努力。虽然未能阻止中共江泽民集团的一意孤行，但是4·25上访让全世界目睹了法轮功学员们大善大忍的胸怀，以及平静、祥和、理性的修炼素养，被誉为中华大地上的一座道德丰碑。◇

★神韵艺术团继2026年1月在比邻弗吉尼亚州的美国首都华盛顿特区上演10场之后，4月23日、24日在弗吉尼亚州的诺福克再度上演。联邦议员、州议员及各级政要纷纷颁发褒奖或贺信，表彰神韵艺术团对艺术与文化遗产的卓越贡献，并盛赞演出精彩绝伦，欢迎各界民众观赏演出。

★2026年4月20日，在加拿大国会国际人权小组委员会举行的“跨国镇压的全球影响”听证会上，加拿大法轮大法学会协调人戴工羽在陈述中表示，“两份泄露的中共文件显示，习近平亲自下令开展新的协调行动。近两年来，中共的跨国镇压明显升级，涵盖虚假信息、法律战及针对神韵艺术团的虚假炸弹威胁。”

★2026年4月15日，英国安全部长丹·贾维斯回信给上议院议员奥尔顿勋爵，就一名法轮功学员在大英博物馆真相点遭到中共帮凶袭击事件，重申英国政府对法轮功的坚定支持态度：法轮功学员依法享有和平践行其信仰的权利。任何外国政府在英国境内针对个人实施或指使的违法行为，都是绝不容忍的。议员们也纷纷谴责中共的跨国镇压。◇

四·二五：“极高的动员效率是如何达成的？”

文：笔农

【明慧网】“四二五”事件（1999年4月25日）是中国当代史上一个极具曝光度的事件。尽管时间已过去二十多年，许多人仍感到好奇：

在1999年那个互联网尚未普及、移动通讯尚不发达的年代，上万人在极短时间内从各地汇集到北京中心地带，这种极高的动员效率是如何达成的？是完全自发的“口碑相传”，还是存在一套严密的地下组织网络？

根据明慧网及相关参与者的记述，针对“1999年通讯不发达情况下如何实现万人汇集”这一疑问，其文章中讲述的事实与逻辑可以整理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消息的传递方式：以“炼功点”为中心的口碑相传

在明慧网的记述中，信息的扩散并非依赖现代通讯工具，而是基于当时遍布全国的物理网络：

其一，炼功点的口耳相传：当时全国几乎每十个人中就有一个人在学炼法轮功，各地都有晨炼的“炼功点”。天津事件发生后，相关的抓捕消息和“天津不让人，让去北京反映情况”的消息，通过辅导员（义工）或学员在早晨炼功



▲ 1999年4月25日，万名法轮功学员在北京信访办和平请愿。（明慧网）

时互相告知。

其二，物理流传：学员之间通过登门拜访、电话（座机）询问、以及在炼功点交换信息。这种“人传人”的速度，在拥有至少数千万学员的群体中，如呈现出几何级数的增长，并不奇怪。

其三，有对比才知多是少：很多人一听“上万人”就觉得“哇，这么多人”，这是从数字上判断；并且，在现实体感中，一万到三万人聚集在北京市中心街道或特定区域，会产生极强的视觉冲击力和交通挤塞感。

然而，10,000人是多还是少呢？大家知道，如果是一场大型的露天音乐会，单日参加人数可能会有30,000人—80,000人。如果去了80,000人，人们会说盛况空前；只去了10,000人，人们会说人太

少了，不是10,000人少，而是“有比较才有鉴别”。

那么4·25呢？当时中国有8,000万—1亿人炼功，只去了10,000人—30,000人，这个比例，应该说是很少、不多，而不是很多。

从天津事件（4月22日、23日）到四二五（4月25日），中间只有两三天，10,000这个传播速度，其实很符合当时中国的通讯条件，以及法轮功学员相互之间保持联系的草根方式。

二、是“自发”还是“动员”？

明慧网文章中反复出现的描述是，4·25事件并非由某个“中心”下令发起的，而是大量个体的自发选择：

1) 许多文章提到，学员听到天津抓人的消息后，基于“为大法说句公道话”的朴素

心理，自发决定前往。

2) 文章记述中，并没有一个统一的指挥部。很多人是到了北京、到了信访局附近才发现有这么多志同道合的人。

3) 时间线的演进(1999年4月22日-4月25日)

根据明慧网整理的事实，万人汇集经历了一个约三天的发酵过程：

- 4月22日-23日：天津事件发生，消息开始在天津及周边的河北、北京地区传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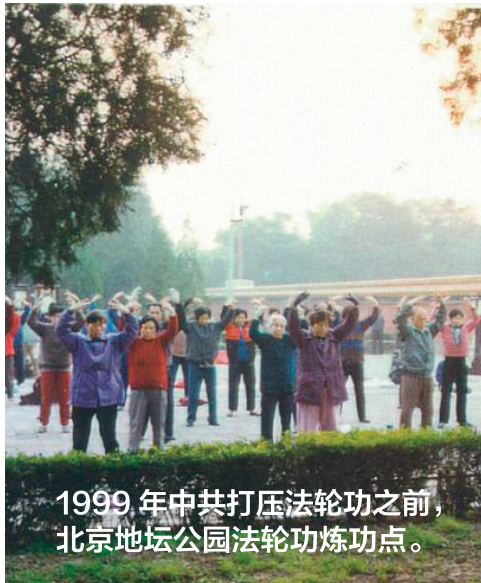
- 4月24日：更多外地学员得知消息，开始动身。由于北京交通便利，周边省份的学员通过火车、长途汽车甚至骑自行车在夜间赶往北京。

- 4月25日凌晨：早期到达的学员多聚集在信访局所在的府右街一带。文章描述称，随着后续赶到的人越来越多，现场警察开始引导人群，最终形成了围绕中南海/中央信访办的态势。

4) 现场秩序的维持事实
针对外界对“组织严密”的猜疑，明慧网文章通过描述细节来解释这种“秩序”的来源：

- 行为准则：文章称，学员们自觉遵守真、善、忍的原则，现场没有人领队喊口号，大家只是安静地站立、读书、或者炼功。

- 环境维护：广为人知的细节是，学员在离开时捡起了地上的垃圾，甚至包括警察丢掉的烟头。明慧网认为，这



种“严密”其实是个人高度自律的体现，而非军事化的指挥。

5) 对“引导”情节的记录

明慧网文章中经常提到一个关键细节：警察带路。

许多亲历者在文章中回忆，25日早晨他们到达时并不清楚该站在哪里，是现场的警察将不同方向涌入的人群引向府右街，甚至“有警察引领我们来到了新华门的红墙外”。

《“四·二五”我们在长安街上》一文写道：“我们站在新华南门东边大约三、四十米的地方（在四·二五的资料片里就有这一地段），对面马路上站着持枪的军人，大约三五步站一个人。他们并不是象在门口站岗那样一动不动，他们来回走动，有的抽烟，有的交头接耳，还有的走到我们面前，看我们手里拿的东西，他们有些人看起来不耐烦。而我们这边男女老少、来自全国各地的普通老百姓，则是安安静静、满脸平和的站着。”

新华门是一个很敏感的地点，戒备森严，没有“人民”的身影。突然有几十甚至上百的普通百姓停留在那里，视觉上会感到非常突兀，无论你是坐着还是站着。只需要强调一下人数，绝大部分中国人都很轻易地就相信，这是一场对中南海的“包围”。至于“围攻”一说如何形成的，我们没有找到任何“攻”（也就是攻击、言语和肢体冲突）的证词，不知党报和央视用“围攻”一词的依据是什么。

另一个情节是，在天津事件现场，当地学员被告知：此事必须去北京才能解决。

结语：

在历史研究中，法轮功学员当事人的回忆，被视为“参与者叙事”。它解释了在通讯技术落后的年代，强大的共同信仰和基层社交网络(炼功点)如何一定程度地起到了现代通讯工具的作用，完成了上万人的群体集结。此事如果发生在智能手机时代，那就不止上万人了。

然而，当一个高度自律的百姓群体，以一种极为安静平和的方式，站到了高度敏感的政治空间周围时，这种“出现”和“静默”在时任总理朱镕基的眼中，是一个直接与群众沟通、座谈的好机会；但在时任总书记江泽民的心里，却成了比呐喊更具威慑力的“攻击”吧。◇

“四·二五”我们在长安街上

【明慧网】时间一晃，20几年过去了，又到了这个神圣的日子4.25，作为当年“4.25”的亲历者，往事又浮现在眼前。

“我也是大法中的一员！”

1999年4月24日是星期六，电话突然响起，有同修（法轮功学员之间的称呼）告知：天津的法轮功学员被抓，警察不放人，让去北京反映情况；要营救被非法抓捕的天津同修，想去的话，有同修租的车，在哪里停靠，几点出发。

我们家是炼功点，当天就告知所有的学员，有3个人表示一定会去。我们也在第一时间通知了我们认识的刚入门修炼的学员，包括我们两边的父母和兄弟姐妹，那时候电话

还没在农村普及，有些学员家我们是骑自行车上门告知的。

晚上，我们开始准备出门的东西，点心、水壶等。14岁的女儿把她平时上学带的小水壶也装进我们的包。我们惊讶地问她：“你也去？”我们并没打算带着她。因为作为“六四屠杀”的见证者，我们早知道了那个血雨腥风凌晨的惨无人道，这才刚过去10年，他们会不会再屠杀一次民众？我们可以“朝闻道，夕可死”，但孩子还没经历人生，对大法认识有多深？如果是跟着凑热闹，那不能算是修炼。于是我们劝阻她：“不要去了，那里可能架着机关枪、埋伏着坦克呢。爸爸妈妈如果回不来了，你就投奔姑姑和姨妈生活吧。”女儿坚决地回答：“我不怕，

你们也没权利阻挡我，我也是大法中的一员！”

话说到这份上，我们也只好答应带着她，并在她的裤子里缝上了两百元钱，嘱咐她：如果走散了，用这钱回家。

看到法轮

在去北京的一辆大客上，看到了我的婆婆，她手里挽着一个小布包，那是农村老太太的“标配”，活到将近70岁的她，最远也就到过县城。她是跟同村的另一位老年同修步行赶到县城的，她们不会骑自行车。

25日大约上午8点左右，我们在长安街下了车，居然有警察引领我们来到了新华门的红墙之外，陆陆续续来的大法弟子们很有秩序地站好，在人行道上，规规矩矩地站在马路牙子以内，人群大约站了三四行。在这里，我看到了我的父母，他们和自己炼功点的几个同修站在一起。我们谁都不大声喧哗，（虽然扯开嗓门讲话，是我们大部份农村人的生活习惯），大家交流低声细语。有陌生的同修提醒：年轻人站在最前面，老年同修累了可以在后面坐坐，大家不要双手叉腰，也不要抱在胸前（有对抗的意思）……我们自觉把这些提醒扩散出去。



▲ 1999年4月25日，万名法轮功学员在北京信访办和平请愿。（明慧网）

我们站在新华南门东边大约30、40米的地方，对面马路上站着持枪的军人，大约三五步站一个人。他们并不是象在门口站岗那样一动不动，他们来回走动，有的抽烟，有的交头接耳，还有的走到我们面前，看我们手里拿的东西，他们有些人看起来不耐烦。而我们这边男女老少、来自各地的普通老百姓，则是安安静静、满脸平和地站着，没有一个人表现出焦灼、焦躁。

大约9、10点的时候，有人喊：“看树尖上，法轮，大法轮！”我们周围的同修都跟着往天上望，大家都看见了，甚至对面的军人也有人看见了，面露惊讶。

惊人的一幕发生了

中午，大家互相转换着自己的食物：你给我点心，我给你鸡蛋等等。上厕所，有北京的同修引领。北京胡同那时候还是“旱厕”，即使能冲水，也是很简陋的，再加上突然这么多人涌入，脏的程度可想而知。但是我们进去，看到的却出乎意外的干净，蹲坑周围撒了石灰，就象刚打扫的一样。原来，北京的同修就在厕所外候着，几分钟就打扫一次！

大约下午4、5点钟，新华门那里喧闹起来，能清晰地听到人们热情的招呼：朱总理！也听到了朱身边的工作人员说：“不能都聚在这里，派几个代表里边谈谈。”有人高



▲2019年5月18日，法轮功学员五千人在纽约总督岛公园排出法輪图形和“真善忍”三个字。

举手喊：我去，我去！具体去了几个，没看到。人群小小动荡了一会儿，马上又平静下来。大家互相鼓励：代表不出来，我们绝不走散。

我们义务辅导站站长是一个老北京人，60多岁，他从行列里挤过来，挨个通知我们：一会儿通知大家，散开的时候顺着长安街往西走，我们的集合地在某某汽车站。

天黑了，路灯亮起来了。大约7点钟的样子，人群中传来同修的声音，不大，但周边都能听到：“大家互相转告，答应我们的要求了，天津放人了。大家回家吧，把周围环境清理干净啊！”

于是惊人的一幕发生了，大家一同弯腰低头，寻找自己脚下的纸屑、食物残渣，甚至

对面军人丢的烟头我们都捡起来攥在自己手里，然后向左向右地马上离开。

一家人团聚在长安街

我们夫妻拉着女儿，一边寻找双方的老人，最后我们六口家人：我父母、我婆婆、我们夫妻和女儿，相互靠近着，一路向西疾走。将近70岁的3个老人紧紧跟随着我们的步伐，年少的女儿也没有掉队，大约15华里，1个半小时，中途都没有休息，到了目的地，大家都没有筋疲力尽的感觉，真是不可思议。

在汽车站，站长和另外几个有协调能力的同修与车站领导商议租车事宜，车站终于给配齐了五辆大客车，我们县的同修上了返回的车。

汽车刚发动，就听天空中雷声滚滚，两个小时到了县城。站长嘱咐县城的同修，把农村的同修接到自己家住一晚。这时，雨点开始落了。等我们赶到自己家，刚打开屋门，大雨倾泻而下。多年没有遇到过五一前下如此大的雨。

后来听说，当时许多地方的公安都是应上级指令，去北京接上访的大法学员。我们县也派了几辆车，但是一个人也没接到，据说我县公安因此还受到上级的表扬。

之所以把这个汽车站名字隐去，是因为车站领导被我们感动，没有收费，义务送我们的。◇

七旬邓天玉遭看守所注射试验针药 痛苦不堪

【明慧网】2021年5月，时年71岁的湖北省荆州市法轮功学员邓天玉已被绑架关押7个月。期间，荆州区看守所副所长李莉口头通知她，沙市区法院已对她判处5年徒刑。随后，李莉配合相关人员对邓天玉进行了两次大量抽血，并给她注射不明试验性药物。

注射后，邓天玉全身剧烈抽搐，痛苦难忍，在地上挣扎滚动，持续两个多月。4个月后，即2021年9月14日，她被劫押至湖北汉口监狱，遭受进一步的非人折磨。

中共治下 善良人被迫害

1998年10月，邓天玉开始修炼法轮大法。她按照大法书中真、善、忍的道理要求自己，改变了暴躁的脾气，原来每天折磨她的眩晕症、关节炎、肩周炎、颈椎炎、腰肌劳损等疾病不知不觉全好了。法轮大法的修炼，不仅让她身心受益，也让她知道了因果报应、不失不得、要替他人着想的道理。单位领导同事都说她变了个人，宽容、善良。

中共1999年7月20日开始迫害法轮功后，邓天玉因不放弃真善忍信仰，遭受3次非法判刑，刑期共计12年，她遭受酷刑折磨，原本健康的修炼人被折磨成残疾人，她的退休金待遇被剥夺。

主要迫害事实如下：

2020年10月18日，邓天玉被沙市区610头目张魏红（已遭恶报死亡）等人绑架。在沙市区解放路派出所，邓天玉被威胁、恐吓逼供超过48小时，致使她血压飙升至240 mm Hg，即使这样，她被劫入荆州市石首看守所。

2021年7月6日，荆州区看守所人员（其中李莉负有责任）把邓天玉当作小白鼠做实验，先强行从她身上抽出两大针管的血，接着给她注射不明药物。同年9月2日，再次从邓天玉



▲ 中共对法轮功学员实施药物迫害示意图。（明慧网）

身上抽出两大管血做检测。被注射不明药物之后，邓天玉老人全身抽搐，满头、满嘴起包（头上的包至今未完全消失），痛苦不堪，在地上挣扎打滚，持续两个月。

有人议论说，给邓天玉注射的是研发艾滋病的实验药物。看到邓天玉老太太痛不欲生，一次，李莉良心发现，向邓天玉道歉说：对不起，之前不知道药物会造成如此严重的后果。然而，在中共灭绝人性的迫害中，邓天玉仍被继续非法关押，直到被劫持入狱。

邓天玉被投牢到湖北汉口监狱入监监区后，分别在2021年9月14日和同年10月2日、11月上旬，被强行抽了三次血，每次都是两大针管（与荆州区看守所抽的剂量相同），可能是跟踪对艾滋病药物实验的检测。

因邓天玉坚决不写“悔过书”等，监狱教育科长华云叫嚣：“我知道你不会转化，你以前是‘宝丰女子监狱’有名的‘江姐’，我就是要假的，假‘转化’就行。”

邓天玉不配合，因此被长期迫害，比如：米饭中下药、群殴、灌粪便等，致使身体非常衰弱，2024年7月3日，在八监区做卫生时，突然倒地。检查结果说是中风、脑溢血、脑梗、半身不遂。

2025年10月18日，时年75岁的邓天玉刑满回到家。回家后，她仍无法正常走路。◇

反思是人类文明的共有机制

文：一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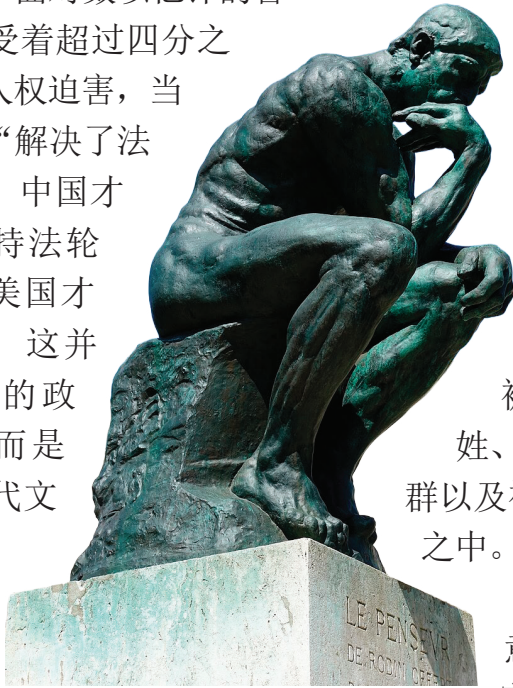
【明慧网】在人类文明的发展史中，人权与道义始终是维系社会稳定与国际秩序的核心力量。面对数以亿计的善良人民遭受着超过四分之一世纪的人权迫害，当有人提出“解决了法轮功问题，中国才能好。支持法轮功人权，美国才能好”时，这并不是夸张的政治口号，而是触及了现代文明的一个非常核心的逻辑：人权与道义的联动效应。

对于中国，解决法轮功问题不仅是处理一个庞大社会群体的冤情，更本质的是修复法治体系和重塑道德底线。真善忍是普世价值。如果一个基于真、善、忍的庞大信仰群体可以被个别人随意定性、剥夺基本权利而得不到法律的保护，那么这种体制逻辑终将伤害到每一个普通公民。

对于美国及国际社会，这涉及到全球文明的价值共识。支持人权不仅仅是政治姿态，更是对普世价值的捍卫。如果国际社会在面对大规模人

权迫害时选择沉默，那么这种价值观的倒退，最终也会侵蚀美国及文明世界自身的根基。

正如《四二五：“极高的动员效率是如何达成的？”》和《四二五：天津事件是全部原因吗？》两篇文章所梳理的那样，历史的真相往往藏在那些被掩埋的事实、被扣押的批示、被剥夺权益的百姓、被刻意引导的人群以及被抹黑的善意言行之中。



当人们开始愿意剥开层层迷雾去审视这些细节时，

反思就已经开始了。反思让社会避免盲目重复错误，为国家赢得神的佑护。反思之所以重要，还因为它是人类社会避免崩坏、维持传统和文明连续性的关键的自我修正机制。

人权从来不是“某个群体”的问题。价值体系的崩塌会反噬所有国家，沉默会形成“负面示范效应”。如果国际社会对严重的人权问题不再关心，那么自由世界内部的价值共识就会被弱化。因此，国际社会关注人权，不仅是“道义”，也是维护自身制度稳定的一种方式。◇

明慧统计

根据明慧网报道统计，2026年2月份获知，至少又有43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判刑入狱，分布于中国大陆的14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其中被非法判刑的最年长者90岁。判刑迫害严重的地区依次为：山东省14人，辽宁省8人，黑龙江省5人，吉林省4人。其中，山西73岁夏忆林女士刚结束4年冤狱回家，在明慧网发表严正声明，宣布在监狱高压下被迫做出的所谓“保证”全部作废。仅3个月后，又被中共法院非法判刑3年半。夏忆林先后4次被非法判刑，累计冤狱已达15年。另有济南市90岁的王传文老先生，被非法判刑两年。老人坚决不服表示将上诉。◇

三退大计

据退党网站显示，截止到本周，办理了三退（退党团队）的中国人为4亿6千多万。

办理方法：1. 翻墙登录退党网站：tuidang.org 2. 用海外信箱发邮件：santui@tuidang.org 3. 请法轮功学员帮助。

天安门自焚疑点

- (1) 王进东衣服烧糊了，两腿间的绿色雪碧瓶和头发却完好无损。为什么？
- (2) 那一天，为什么众多警察都背着灭火器巡逻？
- (3) 录像慢镜头播放显示，刘春玲是被一名“军大衣”击中后脑倒地而死。
- (4) 现场特写、中景、全景镜头俱全，警察执灭火毯摆拍，谁安排的？

骨髓癌患者：这句真言我要永远念下去

【明慧网】我的邻居王虹（化名），七十来岁，是个没有文化且泼辣、强悍的村妇。以前我跟她讲法轮功真相，她从来不听，说：“我不信这个。我这身体比谁都好，我比男子都能干。”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就在去年十二月的一天，王虹突然浑身没劲、酸痛、不想吃饭。又过了两天，王虹就浑身疼，疼得睡不着觉。起初她以为是感冒了，也没在意。可不几天，她竟起不来床了，下不了地了。她的家人就给她请了本村医生给她输上了液。可是几天后病情也不见好转。

花光积蓄还借债

家人一看不行，就把她送到了县医院，经检查化验，确诊为骨髓癌。这真是晴天霹雳，当时全家人都懵了。这可怎么办啊！县医院医生建议她去大医院治疗。就这样，当天王虹就被家人送到了北京顶级的301医院。她在301医院治疗了十四天，两个疗程。就这十四天她花完了家中所有的积蓄不算，还借了三十万元的外债。费用太大了，这对一个普通的农村家庭，怎么能承受得了呢！

后来实在是借不到钱了，王虹就只好回家。回家后她疼



得一把一把的拽自己的头发，或者用头撞墙，她太痛苦了。她的丈夫见状，那真是痛彻心腑啊。当时正逢寒冬腊月，又刚下了场大雪，晚上零下二十多度，她的丈夫独自一人在大街上踱来踱去的，唉声叹气。这样的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头啊！

后来她丈夫让一个亲戚给贷了几万元钱。他给王虹买了一盒进口的针剂，每隔十四天打一针，可这一针就是一万一千元人民币啊，如此昂贵的药物，贷的这几万元的钱很快就用完了。往下可怎么办啊！这愁坏了家人。

一句真言化解难题

我知道了这个情况后，再次来到了王虹家。我让她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

告诉她，只要诚心诚意的念，大法的师父就一定会管她。这次王虹没有拒绝。

说来神奇，就在王虹诚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的第三天，她觉得全身不怎么疼了，能下地了，也有精神了，也想吃东西了。她下地后第一件事就是给师父磕了一顿头，她边磕边说：“大法师父谢谢您！谢谢您呀！”

这一天正是王虹该打针的日子，她没有打。就这样，没多少天，王虹觉得全身哪都不疼了，又和原来的自己一样了，什么活都能干了。王虹的骨髓癌好了。

现在王虹见人就讲：“是法轮功救了我，是大法师父救了我的命，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我要永远念下去！谁不信我也信。”◇

嘉州监狱：酷刑、威胁与制度化迫害

【明慧网】位于乐山市市中区全福镇的嘉州监狱，隶属四川省监狱管理局。原五马坪监狱于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日整体迁入并启用。二零一四年八月，乐山沙湾监狱并入，形成如今的规模。

九监区：嘉州监狱最黑暗的迫害中心

嘉州监狱启用后，于二零一四年元月新组建了九监区（入监队，该入监队在五马坪时隶属于四监区）。该监区是迫害法轮功学员的场所，也是监狱最黑暗的一隅。当法轮功学员被劫持到这里，犯人袁友平（新犯组迫害法轮功学员的组长）等罪犯就把编排好的迫害程序告诉法轮功学员：“你们进了入监队不写‘三书’的只有一个结果，那就是：‘三天憔悴，一个星期崩溃，半个月病床上睡，一个月地狱相会。’”以此威胁、恐吓法轮功学员。

原五马坪监狱一直是迫害法轮功学员的黑窝，由于过去有田义副监狱长、恶人高虎、教育科副科长邵凌（现在是三监区监区长）、教官杨希林、九监区监区长陈国顺、邱云南、警察龚劲夫等丧失理智地迫害法轮功学员，得到四川省中共邪党委、四川省中共邪政法委、四川省中共邪党“610”办公室的认可，从二零一零年起四川全省被冤判的男性法轮功学员全部被劫持到这里。大约二零二一年入监队（新犯组）纳入四监区（老、病、残监区）。到目前为止主要直接参与迫害的主要人员有：四监区龚劲夫、教育科的人、每个监区一名警察及四监区“转教组”的六名犯人。

“转教组”于二零二四年五月成立，龚劲夫全权领导操控，有一个组长五个组员共六名犯人组成，专门用于强制“转化”法轮功学员，每一次劫持一个法轮功学员进该组强行“转化”。

主要迫害者：四监区龚劲夫

四监区警察龚劲夫，男，55岁左右；身

高约1.8米；外表平常，却对法轮功怀有强烈敌意（受中共宣传洗脑）。警衔：两杠三星，具说家在成都；手机：18086889501。他几乎参与了所有被劫持至嘉州监狱的法轮功学员的迫害，已有近二十年的记录。

法轮功学员入监约十天后，龚劲夫和教育科警察会进行第一次谈话，主要了解法轮功学员对迫害的思想认识、对大法的坚定程度，然后根据了解的情况，设计迫害方案。谈话内容多依据所谓“三书一证”（起诉书、判决书、裁定书、逮捕证）中的信息。

曾有一名法轮功学员在入监后，在和龚劲夫与教育科的杨希林首次谈话时，明确表示：“我不违法、我无罪。”然后讲述了在非法庭审时，律师与他本人都依法作了“无罪辩护”，律师向审判长递交了证明法轮功不是邪教的《公通字39通知》和《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第50号令》，并请审判长、法官、检察官拿出指控法轮功是邪教的有效法律依据，质问他们用刑法300条（即利用邪教破坏法律实施）起诉当事人，当事人到底利用了哪个邪教、破坏了哪一部法律或哪一条法律的实施。对方均无法回答。该学员指出，监狱收押所依据的“三书一证”本身就缺乏法律依据。龚劲夫听完后说：“有罪无罪等刑法执行科来与你说。”草草收场。

狱警与犯人打手的威胁：制度性迫害的体现

监区头目、狱警及犯人打手都这样威胁法轮功学员：“不转化，不写三书，迫害死你怎么样？整死你怎么样？弄死你怎么样？把你整伤、整残又能怎样？”其态度如豺狼般凶狠。

在这种思想驱动下，狱警将迫害法轮功学员视为升职、加星、挣表现的途径；犯人则把迫害视为加分、减刑、讨好警察的手段，因此肆无忌惮。

警察龚劲夫以前还嚣张地说：“我们不

能用手和脚打你们，但我们可以用警械致伤、致残或致死你们，大不了就是‘用警不当’，我照样上班领工资。你们能拿我们怎么样？而且我们还受到四川省监狱管理局局长刘志诚、嘉州监狱监狱长祝伟、教育科副科长邵凌、监区长陈国胜的认可。我们还有什么可怕的？”

教育科的强制洗脑：逼写“三书”与家庭要挟

监狱的教育科负责对法轮功学员强行进行所谓的思想改造，强迫写所谓的“三书”（保证书、悔过书、揭批书），强迫改变信仰。教育科基本上每天都有人在入监队，杨希林去的时间最多。法轮功学员在他们规定的时间没有写“三书”的就被罚长时间站军姿、坐军姿，同时用法轮功学员的子女或其亲属的工作、升学、当兵、考公务员等等。来要挟写“三书”。

二零一三年，教育科副科长邵凌就对一位不写“三书”的法轮功学员说：“你不写三书，我叫你们市‘610’把你儿子喊来劝你写。”该法轮功学员在邵凌的要挟下违心第写了“三书”。但邵凌还是叫610解除了他儿子的工作合同。

教育科狱警杨希林找一位法轮功学员谈话，该学员告诉他：“法轮功不是邪教，我不违法，我无罪。有公安部公通字【2000】39号文件里公布的中国现有邪教组织共14种，没有法轮功，每一种邪教是由谁创立的，在什么地方活动，有多少信众，都有明确的阐述。这是中国现在判定邪教的法律依据。”杨希林说现在已有25种了，并说要拿给他看，可杨希林一直没再来。可见其为迫害不惜编造谎言。

拒绝写“三书”后的酷刑与人格侮辱

不写“三书”监狱就加重迫害，什么恶毒手段都能使用出来：辱骂、殴打、捆束缚带、穿束缚衣、使用催泪瓦斯、芥末水（辣椒水）喷眼睛、警棍电击敏感部位、多根警棍同时电击、“开摩托车”、打毒针等残忍

手段摧残法轮功学员；限制睡觉（最少的每晚上只能睡两个小时，零点至两点）；白天面壁站或在太阳下暴晒（面对太阳），晚上回监舍坐军姿，不准与他人接触、谈话、限制人身自由、不准写信、不能见检察官，全天包夹。限制吃饭时间只有二十秒，一日三餐都一样，每餐只能吃一两左右的米饭，仅够吊命不死。在五马坪监狱时，规定将饭碗放在地上，不能将碗端起来，只准法轮功学员盘腿坐地上，使劲低下头象动物吃食一般吞咽，由看管的人从一数到二十，大约二十秒，吃多少算多少，数完数就立即停止，吃得慢了，一两米饭也没吃下，更别奢望吃上一点下饭菜或咸菜。然后继续坐军姿。这种为了强制人放弃信仰的迫害，从人格尊严的侮辱、到肉体上的折磨闻所未闻，真是中共邪党的一大创举。

长期洗脑与迫害指令

嘉州监狱为什么对佛法修炼的法轮功学员如此暴力和持续迫害，是因为受邪恶的中共几十年的强化洗脑，接受的是暴力理论、专政理论、斗争哲学、进化论、现代科学、运动论、唯物论、无神论等等，被灌输了邪恶的共产党的思想，代替了人的本性。所以迫害修心向善的法轮功学员，迫害手段邪恶至极。

嘉州监狱为了所谓的“转化率”，可以说是无所不用其极，就象一名刚走出冤狱的法轮功学员所说：“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他们做不到的。”为了强制“转化”法轮功学员，中共监狱使用各种残忍的迫害手段。一边酷刑迫害，一边严密封锁迫害信息。暴露其见不得光的心理。

元凶江泽民下达迫害法轮功的指令：“打死白打，打死算自杀”；“不查身源，直接火化”；“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截断，肉体上消灭。”至今嘉州监狱在秘密的执行一个北京中共司法部的文件，强制法轮功学员“转化”、强制写“三书”。（节选，文/四川大法弟子）◇